

含蓄意指与隐喻的等值对应

——符号传播意义的深层机制之一

隋岩

(中国传媒大学 电视与新闻学院, 北京 100024)

【摘要】 含蓄意指和隐喻, 原本分属符号学与修辞学两个不同领域的意义建构模式, 两个学科的嫁接使我们认识到: 隐喻是含蓄意指的等值转换; 正是借助这种等值转换, 新的意义才得以建构。此外, 隐喻和换喻从来是修辞学等领域里争讼不休的难题, 借助符号学的视角, 经年纠葛在一起的这一对概念可以轻易地被区分被识别: 即隐喻是两个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之间存在着相似性。

【关键词】 含蓄意指; 隐喻; 等值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含蓄意指是符号学所示的建构意义的模式, 具有重塑世界、言说神话的功能。那么这种意义建构模式在传播信息时是如何使人相信的呢? 它的深层机制是怎样运行的呢? 在构建新的含蓄意指时是如何将所指₂渗透到能指₁的呢? 认知语言学告诉我们, 是借助隐喻这种思维方式。

一、含蓄意指对意义的建构与传播方式

在理解含蓄意指之前, 我们先要弄清意指和直接意指这两个概念。意指就是以能指指向所指、以能指表达所指的组合行为, 也即把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 成为符号的一种组合过程。如把“书桌”这个能指, 与“读书写字用的桌子”这个所指组合在一起, 就有了“书桌”这个符号, 以供懂汉语的人使用; 把“desk”这个能指, 与“piece of furniture(not a table) with a flat or sloping top and drawers at which to read, write or do business, eg one for office or school use”这个所指组合在一起, 就有了“desk”这个符号, 以供说英语的人使用; 这两个例子的组合过程, 都是意指行为、意指作用、或者称作意指组合。

[作者简介] 隋岩,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罗兰·巴尔特解释说，一切意指组合^[1]都包含一个表达平面（能指E）和一个内容平面（所指C），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如图1-1表示，左边的长方形代表能指E，右边的长方形代表所指C，使两个长方形分开的中间那一竖划代表意指行为R，ERC组合就是一个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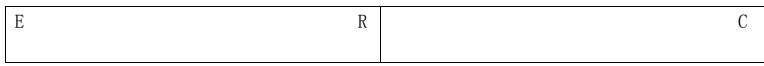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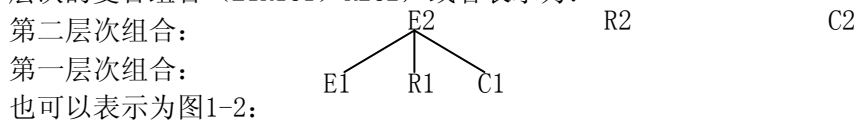


图 1-1

一个单纯的ERC组合就是一个直接意指组合。但是，当一个ERC组合本身变成另一个ERC组合中的某一部分时，第二组合中就包含着第一组合，或者说第二组合就成为第一组合的引申。问题是第一组合成为第二组合中的哪一部分，情况会有两种，即成为第二组合的能指E或是所指C：

第一种情况，当一个组合（E1R1C1）^[2]成为另一个组合（E2R2C2）的能指表达面E2时，就有了多层次的复合组合（E1R1C1）R2C2，或者表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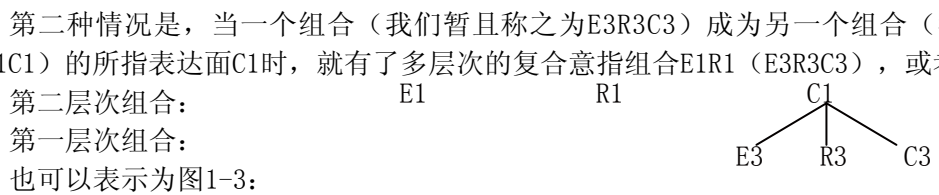


这就是含蓄意指组合，它虽然也包含着能指、所指和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意指作用，但其中第一层面的组合E1R1C1构成直接意指层面，第二层面的组合E2R2C2构成含蓄意指层面，换句话说，一个含蓄意指组合的能指表达面E2本身，其实是由另一个意指组合E1R1C1构成的。可见含蓄意指是由复合意指组合构成的。但是无论这个组合怎样复杂，总会有最初的直接意指的能指，而以这些能指为中介的符号，则早已在形成含蓄意指之前被传递它们的直接意指的信息自然化了，这点我们将在后面详述。



图 1-2

第二种情况是，当一个组合（我们暂且称之为E3R3C3）成为另一个组合（我们暂且称之为E1R1C1）的所指表达面C1时，就有了多层次的复合意指组合E1R1（E3R3C3），或者表示为：



如此，某一组合E3R3C3不像上述在含蓄意指中成为表达平面，而是成为另一组合E1R1C1的内容平面或所指。这就是所谓的元语言，也即元语言组合的内容平面（C1）本身是由另一个意指组合（E3R3C3）构成的^[3]。



图 1-3

含蓄意指与元语言是两种不同的意指组合，以两种不同的模式建构着意义。含蓄意指的构建，就是通过寻找所指2与能指1之间的某些能启发人产生联想的相关之处，如图1-4，银屏上的超女李宇春，让人想象着大众歌星一夜成名；图1-5所建构的，则是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启发人联想人类情感和思想的彻底解放。

E2	R2	一夜成名 C2
E1 电视画面中的李宇春	R1	一名来自湖北的 20 岁女孩 C1

图 1-4

E2	R2 人	类情感和思想的彻底解放 C2
E1 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	R1	这首曲本身所有音符节奏等 C1

图 1-5

元语言则是通过寻找能指1与能指3之间的相关性，或推理出一种逻辑延伸，或建立一种阐释关系，从而建构意义。

含蓄意指与元语言是两种不同的意指组合，以两种不同的模式建构着意义。含蓄意指的构建，就是通过寻找所指2与能指1之间的某些能启发人产生联想的相关之处，如图1-4，银屏上的超女李宇春，让人想象着大众歌星一夜成名；图1-5所建构的，则是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启发人联想人类情感和思想的彻底解放。

图1-6所示的元语言告诉我们，李宇春暗示着所有参加海选女孩的明天；而在图1-7中，音乐本身作为能指，用以描绘其所指（如悲伤、狂乱、激昂、奔放等）的语言也是一种意指组合，由此成为一个元语言。

E1 电视画面中的李宇春	R1		C1
		E3 所有参加海选的女孩	R3
			C3

图 1-6

E1 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	R1		C1
		E3 阐释这首交响曲的语言	R3
			C3

图 1-7

如果把上述两种复合意指再组合在一起，即把合含蓄意指与元语言再组合到一起，如图1-8和1-9，就是所谓的神话^[4]。

E2		R2	一夜成名 C2
E1 电视画面中的李宇春	R1		一名来自湖北的 20 岁女孩 C1
		E3 所有参加海选的女孩	R3
			C3

图 1-8

E2		R2	人类情感和思想的彻底解放 C2
E1 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	R1		这首曲本身所有音符节奏等 C1
		E3 阐释这首交响曲的语言	R3
			C3

图 1-9

二、质疑罗曼·雅克布逊

很久以来，隐喻和换喻一直是修辞学、语言学、文论、乃至哲学等领域里争讼不休的难题，而许多研究者都将俄裔美籍语言学大师、布拉格学派创立人罗曼·雅克布逊的论断奉为圭臬。雅克布逊通过对失语症的研究，指出了人类语言发展的两个轴向，也即“隐喻和换喻的两极”。雅氏的学说的确为我们理解隐喻和换喻本身、理解含蓄意指和元语言及后面将要论述的自然化机制和普遍化机制提供了启示，但是，他的某些含混之处也为我们区分隐喻和换喻设置了障碍。为了指出雅氏的问题，更为了进一步理解隐喻和换喻，只好将雅克布逊的大段原文摘引如下：

“失语症的表现虽然多种多样，但都不外乎我们刚才描述的两种极端的类型。任何失语症状，其实质都是程度不同的某种损伤。要么是负责选择和替换的官能出了毛病，要么便是组合和结构上下文(contexture)的能力受到了破坏。在前一类型的失语症当中，受到影响的是元语言行为；后一类型则表现为维持语言单位等级体系的能力出现退化。在前者，相似性关系被取消了；在后者，被取消的则是毗连性关系。相似性出现障碍的结果是隐喻无法实现，毗连性出现障碍则使换喻无从进行。

“话语段（discourse）的发展可以沿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进行；这就是说，一个主题（topic）是通过相似性关系或者毗连性关系引导出下一个主题的。由于这两种关系分别在隐喻和换喻当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看来最好用‘隐喻过程’这一术语来称谓前一种情形，而用‘换喻过程’来说明后一种情形。在失语症当中，这两个过程非此即彼地受到抑制，甚至会完全停滞——这一事实使失语症研究对于语言学家来说特别富于教益。然而在正常的言语行为当中，这两个过程是始终在发挥效用的；当然，如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在不同的文化模式、个性和语言风格的影响下，往往是其中一方——不是隐喻过程便是换喻过程——取得对另一方的优势。

“在一次著名的心理学测试当中，人们把一个名词展示给几名儿童，并要求他们说出现在

头脑里出现的最初的言语反映。两种截然相反的语言偏好在这次实验过程中始终存在：所有回答，不是对刺激物的替换，便是对它的补足。在后一种情况下，刺激物和补足语一起构成地道道的某种句法结构，往往为一个语句(sentence)。这两种类型的反应被分别称之为‘替换型反应’和‘谓语型反应’。

“对刺激物‘棚屋’(‘hut’), 反应之一是‘烧毁了’(‘burnt out’); 反应之二则是为‘是一种蹩脚的小房子’(‘is a poor little house’)。这两个反应均为谓语型。然而，第一个反应制造出了一个纯为叙述式的顺序性语境(context), 而在第二个反应里则存在与主语‘棚屋’相关的双重联系：位置上的毗连性(或句法毗连性)和语义上的相似性。

“同一刺激物还引起了下列替换型反应：同言重复‘棚屋’；同义词‘窝棚’(‘cabin’)和‘茅屋’(‘hovel’); 反义词‘宫殿’(‘palace’)以及隐喻‘山洞’(‘den’)和‘地穴’(‘burrow’)。两个词所具有的相互替代的能力便是位置相似性的例证。并且，所有这些回答均在语义相似性(或相悖性)上与主语相联系。然而，该刺激物所引起的换喻式反应，即如‘草屋顶’(‘thatch’), ‘稻草’(‘litter’)和‘贫穷’(‘poverty’)等，则把位置相似性和语义毗连性结合起来，并使之形成对照。”^[5]

从罗曼·雅克布逊对失语症的研究，可见失语症的人存在两种问题：或是找不到选择替换的同义词(或反义词)，无法建立相似性、替换型反应、隐喻；或是一句话讲不完整，组织语言的能力丧失，无法建立毗连性、相关性、补足性、谓语型反应、换喻。

推而广之，对人类的言语活动、包括使用符号的活动来说，选择和替换的官能依凭相似性关系，即替换型反应，寻找相似性就是隐喻等值的建构；组合和结构上下文(contexture)的能力依凭毗连性、相关性、补足性关系，即谓语型反应，寻找毗连性就是换喻等值的建构。

我同意罗曼·雅克布逊提出的“语言的两个轴向”的论断，为我们追寻语言的意义演变提供了很好的原则与方法，但是他的某些具体论述却存在问题，混淆相关命题：

问题一是，在他的例子中，他认为棚屋与贫穷是换喻的关系，而我认为贫穷是棚屋的含蓄意指/隐喻意指的所指，如图2-1，在某种语境中贫穷与棚屋是隐喻关系。

E2		R2		贫穷 C2
E1 棚屋	R1	用木板盖成的破旧的房子	C1	元语言/换喻
E3 某区域		R3	C3	

图 2-1

问题二是，雅氏认为选择和替换的官能，即替换型关系的隐喻，影响的是元语言行为；而我认为替换型关系的隐喻影响的是含蓄意指行为，因为隐喻对应着含蓄意指。影响元语言的应该是换喻。

问题三是，相似性和毗连性是针对词项(符号)之间的语义关系而言，还是针对位置关系而言，雅氏忽而言白，忽而说黑，引发歧义；我认为，所谓相似性或者毗连性是针对词项(符号)之间位置关系而言，也即针对词项的语法功能、结构功能、叙事功能而言，语义上的相似或相悖并不能区分隐喻或换喻。或者说，相似性主要指两个词(符号)所具有的相互替代的能力，在位置上具有相似性，语义上可以相似但也完全可能相悖，与类似体^[6]对应；毗连性主要指两个词所具有的相互联结的能力，在位置上具有毗连性(或句法上毗连性)，与邻接段对应。在正常的言语行为当中，相似性使隐喻得以实现，毗连性使换喻得以进行。隐喻体现的是替换的关系，即替换型反应，与类似体相对应；换喻体现的是补足的关系，一个词项与补足语一起构成某个语句，即谓语型反应，与邻接段相对应。

在我与雅氏不同的这三个观点中，主要的分歧是，在罗曼·雅克布逊那里，隐喻对应着元语言，而我认为与元语言对应的是换喻，当然前提是我们同意罗兰·巴尔特对元语言的界定，这种观点在其后将要论述的约翰·费斯克那里也会得到印证。

三、隐喻是两个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之间存在着相似性

一个符号与另一个符号如果存在关系的话，那么只有两种情况，一是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C2）之间相似或相悖，也即符号的暗含义（connotation）之间相似或相悖；二是符号的所指事物之间有逻辑联系，也即彼此之间虽然意义上既不相似也不相悖，但却有某种联系，存在某种相关性，也即雅克布逊所谓的毗连性；而符号的能指和直接意指层面的所指（C1）是不可能相似、相悖或相关的。第二种情况是换喻，另文再论。第一种情况就是隐喻（the metaphor），即当两个符号在某种语境下被创建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具有某种相似或相悖的特征时，则可以以符号甲替换符号乙，以象征词替换所要描述的事物——如以泰山代替岳父，以铁窗代替监狱，以老板戏说一位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或者说把一个可感知的标记应用到一个难以言说的对象之上——如以比翼鸟连理枝比喻爱情，以秦晋结盟的典故比喻婚姻，以天堂比喻人死后灵魂居住的快乐地方，如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隐喻。

E2	R2	值得敬仰或可仰仗的事物 C2
E1 泰山	R1	山东境内的一座高山 C1

图 3-1

E2	R2	值得敬仰或可仰仗的人 C2
E1 岳父	R1	妻子的父亲 C1

图 3-2

当“值得敬仰或可仰仗的事物”作为泰山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被创建，“值得敬仰或可仰仗的人”作为岳父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被创建，泰山与岳父这两个符号就有了相似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则可以以符号泰山来描述、替换符号岳父，二者是隐喻关系，如

图3-1和3-2。

当“被禁锢、没有自由”作为铁窗和监狱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被分别建构，铁窗与监狱这两个符号就有了相似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则可以以符号铁窗来描述、替换符号监狱，二者是隐喻关系，如图3-3和3-4。

E2	R2	被禁锢、没有自由 C2
E1 铁窗	R1	用铁做的窗户 C1

图 3-3

E2	R2	被禁锢、没有自由 C2
E1 监狱	R1	监禁犯人的处所 C1

图 3-4

E2	R2	永不分离 C2
E1 比翼鸟	R1	雌雄总在一起飞的一种鸟 C1

图 3-5

E2	R2	永不分离 C2
E1 连理枝	R1	枝干合生在一处的两棵树 C1

图 3-6

当“永不分离”作为比翼鸟、连理枝和爱情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被分别建构，比翼鸟、连理枝与爱情这三个符号就有了相似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则可以以符号比翼鸟、连理枝来描述、替换符号爱情，它们之间是隐喻关系，如图3-5、3-6和3-7。

E2	R2	永不分离 C2
E1 爱情	R1	男女相爱的感情 C1

图 3-7

当“相互忠诚”成为秦晋结盟与婚姻的含蓄意指的所指时，秦晋结盟与婚姻这两个符号就有了相似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则可以以符号秦晋结盟来描述、替换符号婚姻，二者是隐喻关系，如

图3-8和3-9。

当“有社会地位的人”作为老板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被建构，而“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作为非老板的人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被建构，老板与并非老板的人这两个符号（词项）就有了相悖的含蓄意指的所指，而我们在生活中则可以用老板来描述、替换并非老板的人，以示戏谑、调侃、乃至挖苦讽刺，二者是隐喻关系，如图3-10和3-11。

E2	R2	相互忠诚 C2
E1 秦晋结盟	R1	秦晋两国君几代互相婚嫁 C1

图 3-8

E2	R2	相互忠诚 C2
E1 婚姻	R1	结婚的事 C1

图 3-9

E2	R2	有社会地位的人 C2
E1 老板	R1	私营工商业的财产所有者 C1

图 3-10

可见，当新的所指被建构，并成为两个符号共同的含蓄意指的所指时，也即两个符号有了相似的暗含义，有了共同的所指，可以以符号甲代替、描述符号乙，那么两个符号之间的关系就是隐喻。

E2	R2	没有社会地位的人 C2
E1 并非老板的人	R1	没有金钱财富的人 C1

图 3-11

无论是直接意指层面的所指（C1），还是含蓄意指层面的所指（C2），都是符号在其使用者心里的表象，而所指事物则是符号指涉的客观世界。因此隐喻中的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的相似性并非是两个符号所指涉的现实现象具有某种真实的联系，并非两个符号的所指事物有联系，恰恰相反，在现实中它们往往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系，这种相似性不过是人们看待事物时的视角相似，是符号使用者某种心理或意识活动的相似——如泰山与岳父作为符号的能指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相似性，两个符号的所指事物、即客观世界中的泰山与岳父之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联系，而是符号的使用者认为岳父和泰山都是值得敬仰可以依靠的对象；这种相似性不过是为了使原本分离的两个事物、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个领域之间建立新的联系，“显示新的关系”，组织“再造的实在”^[7]，因此是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的相似而不是所指事物的相似——如爱情作为一种情感与作为一种植物的玫瑰花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然而玫瑰花象征爱情却是被全世界各种肤色的人们完全接受的“再造的实在”（如图3-12和3-13）；

E2	R2	美好 C2
E1 玫瑰花	R1	落叶灌木、刺很密、花多为紫色 C1

图 3-12

E2	R2	美好 C2
E1 爱情	R1	男女相爱的感情 C1

图 3-13

这种相似性不过是符号使用者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就是让符号之间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发生联系。再如“蓝色的天使”、“绿色的夜晚”、“白色的曙光”，很显然，天使不是蓝色的，夜晚不是绿色的，曙光也不是白色的，与颜色没有实质联系，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错误，其实是一种有意犯的“字面的错误”，但在常识看来相互不适合的事物之间力图建立某种“亲缘关系”（kinship），以期借助这个“亲缘关系”对对象事物形成一个更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如尼尔逊·古德曼所说，这虽是一个“字面的错误”，但又是一个“隐喻的真理”。

E2	R2	生命 C2
E1 绿色	R1	一种颜色 C1

图 3-14

这种“字面的错误”、“范畴错误”就是含蓄意指的所指的相似性被构建的过程：牺牲语言的日常指称功能（如作为一种颜色的绿色，如图3-14），将其悬

置起来，凸显另外一种内涵（绿色中隐含的生命之意），换言之，削弱语言的第一级指称C1，以便让第二级指称C2出现，从而引发对某种现象的另一种解释（如绿色小区）。

好的隐喻不是简单地表达相似，而是创建某种相似，创建符号含蓄意指的所指之间的相似性。亚里士多德说：“要创造好的隐喻就是看出相似”，要发现那些表面上看来彼此毫不相干的事物内里的某种本质相似，比如，居住社区与某种颜色本是遥不可及的两类事物，“绿色小区”的隐喻却看出了二者皆与生命相系的共同倾向。不过，当“绿色小区、绿色食品、绿色建材、绿色奥运”等雷同的相似性被无数次复制的之后，这样的隐喻也就不再刺激信息接受者的神经，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因此，真正的隐喻是具有创新性的相似。

如上所论，既然隐喻的相似性并非符号直接意指层面的所指之间的相似，并非一个C1于另一个C1的相似，也并非符号的所指事物间的实质的联系，而是一种人为的、创造的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之间的相似，即一个C2与另一个C2之间的相似，那么这种相似就存在于信息的传授双方对本体喻体的理解之中（如爱情与玫瑰花的相似就是认为二者都是美好的事物），这种构建就一定是基于社会、文化、历史、教育的结果，也即是文化的相似、历史的相似、教育的相似。隐喻就是要摧毁符号的表层意义（直接意指的所指），将某种“扭曲”（twist）的意义、“扭曲”的相似强加给原先的范畴（E1）上，似是故意犯的一种“字面错误”、“范畴错误”，目的却是凸显强化某种新的信息（C2）。而这种信息其实就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新的说法，就是新的含蓄意指的所指的建立。因此，这种相似性的构建就是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传播。虽然符号的第一级指称（即C1）被取消或被忽视，而它言说世界的另一种能力（C2）却得到解放。可见，隐喻是一种话语战略，所涉及的对象是超出语言之外的，是关于现实关于世界的一种说法，通过它符号取消自身的日常描述功能，却承担起再描述的特殊功能。改革开放之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不就是当时那种“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的社会精神的另一种表述吗？而今天宣扬的“能挣会花”不也正是消费社会的需要吗？二者不无矛盾，但却都与彼时彼刻的社会价值观相辅相成，都是彼时彼刻社会精神的另一种表述、另一种隐喻，正如约翰·费斯克所言：“是[主控价值]传播于社会的方式之一……是一种训练我们思考的方式”。正是在字面解释（C1）和隐喻解释（C2）之间的张力（tension）中，以及一个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一个C2）与另一个符号的含蓄意指的所指（另一个C2）的想象性相似中，事物被再描述，正是用这种迂回的方式，世界被进一步阐释。

当然，值得警惕的是，隐喻作为一种话语战略，自然会充当意识形态的帮闲，在意识形态的威逼利诱下“过分符号化”，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士不言利”，文化革命中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苗，不好资本主义的草”，还是商品社会中的“金钱万能”，都是走向了极端的超隐喻。

四、含蓄意指是隐喻话语轴向的等值

隐喻作为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其构建机制揭示了讯息产生指涉功能的奥秘。根据罗曼·雅克布逊提出的等值原则，隐喻即是一种等值，正是借助这样的等值，含蓄意指得以建构。

对此，约翰·费斯克有不同的看法：“隐含义（即含蓄意指）并非隐喻，隐含义并非藉由隐喻构建，隐含义虽然也是事物之间特质想象性的移植，但它们强调了层面之间的类同处，同时缩小相异点。”^[8]但我认为，隐喻和含蓄意指都可以既是事物之间相似特质的想象性移植，也完全可以事物之间正相反特制的想象性移植，如反讽（irony），因此，含蓄意指就是藉由隐喻构建的，隐喻就是含蓄意指得以实现的手段。比如，“玫瑰”隐喻着

E2	R2	C2 爱情
E1 玫瑰花	R1	一种植物 C1

“玫瑰花意指爱情”，如图4-1：

图 4-1

从上面的等值原则建构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隐喻对应着含蓄意指。再综合前面对隐喻的分析，我们得出的彼此对应关系是：

替换性反应——在位置上符号（词项）间的相似关系——类似体——隐喻——含蓄意指。

其实，隐喻不过是话语的一种战略。活在这个可爱的世界上，我们的想法太多，感情太丰富，有太多的人我们要讨好，太多的事要描述，太多的思想要表达，太多的阴谋要游说，显然我们的词汇并不够用，狭窄的词语交通状况常常阻塞汹涌而来的思想情感，语无伦次、语焉不详、词不达意的情况时有发生，于是我们千方百计使有限的词汇能负载更多的意义，传达更为丰富的思想情感，于是我们找到了隐喻这种使词义得到引申的途径。语言作为一种规约虽然是沉闷的，话语作为语言的实践却是永远鲜活、灵动、开放的，并极尽其能事地言说着世界，而这一切皆因隐喻在其间运筹帷幄、左右逢源。可见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方式，更是人类的认知方式和传播信息的方式，深植于人类的思维和文化中。表面上看，隐喻以人的经验为理据，实质上它们所依据的是社会、历史和文化，因此，隐喻本身无所谓好坏，一切皆社会、历史、文化使然。那些俗滥的隐喻、哪些宰制人心灵的超隐喻其实不也正是一种文化景观、一种社会现实、一种历史情境的反映吗？

注释：

- [1]我认为翻译成“意指组合”比译成“意指系统”更切合意指本意，也更便于理解。因为意指本身就是一种组合行为。
- [2]这里及下文出现的E1R1C1、E2R2C2、E3R3C3、E4R4C4并无主次之分，只是按照论述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而称之。
- [3]罗兰·巴特在《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中曾把含蓄意指与元语言搞混淆，后来又在《符号学原理》中对二者作了区分，但对元语言的论述不够明晰。
- [4]罗兰·巴尔特所阐释的神话是在直接意指基础上形成的含蓄意指，而本人所理解的神话则是含蓄意指与元语言的再组合。
- [5]罗曼·雅克布逊：《隐喻和换喻的两极》，选自伍蠡甫 胡经之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0-431页。”
- [6]邻接段和类似体是符号学中的一对概念，也被称为横组合（syntagm）和纵聚合（paradigm）。横组合（或称作邻接段）是一种符号次序安排，是一种在既定的序列中受规则制约的符号组合，通常是线性的，并且必须依照严格的次序。纵聚合（或称为类似体）是一组相像到了能够在横组合中互相取代程度的符号。
- [7]这是尼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在他的著作《艺术语言》中提出的，参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办的网站《实践与文本》<http://www.ptext.cn>
- [8]约翰·费斯克著，张锦华等译：《传播符号学理论》，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1页

参考文献：

- [1]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 [2]约翰·费斯克著，张锦华等译：《传播符号学理论》，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 [3]特伦斯·霍克斯著，瞿铁鹏译：《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 [4]罗曼·雅克布逊：《隐喻和换喻的两极》，选自伍蠡甫 胡经之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 [5]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沙·巴利 阿·薛施蔼编，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 [6]艾伦·塞特：《符号、结构主义和电视》，选自《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 [7]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 许绮玲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 [8]隋岩：《从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演变解析符号的社会化》，《现代传播》2009年第6期。
- [9]隋岩：《论含指项中的意义位移》，《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
- [10]隋岩：《符号传播意义的机制——对自然化和普遍化的深度阐释》，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3期。